

批评理论与文学研究丛书

张旭东 蔡翔 主编

# 革命的张力

REVOLUTIONIZING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  
(1924—1930)

程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批评理论与文学研究丛书

I206.6

192

张旭东 蔡翔 主编

# 革命的张力

REVOLUTIONIZING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  
(1924—1930)

程凯 著

I206.6  
192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  
1924—1930/程凯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

(批评理论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3910-0

I. ①革… II. ①程… III. ①新文学(五四)-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2532 号



书名 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

著作责任者 程凯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3910-0/I·272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126.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mm×1300mm 16 开本 23 印张 398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 目 录

## 导 言/1

### 第一章 从“文学家”到“革命文学家”/15

“文学梦”的碰壁与新觉悟/18 政治性言论的资源与出发点/25 对文学的检讨与新文艺观/32 “出路”抑或“畏途”/36

### 第二章 “文学与政治的交错”/40

进入“文学”与“革命”的路径/42 社会改造语境下的文学主张/52 从“血泪文学”到“革命的文学”: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初步想象/56 “实际工作者”对新文学的批评:“革命人”与“革命文”/59 寻找革命文学的“内在立场”: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的中介/62 “新俄文化”的直接经验:召唤“无产阶级文化”/68 《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波格丹诺夫理论的转述与改写/70 “五卅风暴”:新的现实与新的意识起点/74

### 第三章 1925、1926年北京新文化言论界:再造“思想革命”的

#### 起点与终点/83

从“首都革命”到“三·一八惨案”:“五四”时代的终结/83 “北京政变”、“溥仪出宫”与反思“民国”:新文化言论界复兴的历史契机和面向/89 政治与法理、“雪耻与御辱”:围绕“五卅事件”呈现的新文化思想界之分歧/103 党派性言论的确立:反思学生运动与思想革命的路径分歧/110 告别北京/126

### 第四章 “广州事情”/130

广州的“进步”与“落后”/130 从广东大学“文科风潮”到“革命人”/133 广州“右倾”与郁达夫对“革命”的批判/142 成仿吾的理论准备:检讨“趣味”/153 鲁迅的革命观察/165 鲁迅在广州:革命与文学以及革命青年的鲁迅论/173

## 第五章 武汉左派政权下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言论/186

革命文学历史书写原则的检查：“历史性叙述”的出现及其限度/186 “武汉时期”的形成/188 “建设革命文化”：一个官方口号提出的契机与内涵/192 武汉的舆论环境与“革命文艺”的初步讨论/197 检讨“新文化”：从推崇“民众艺术”到批判“资产阶级艺术”/204 世代交替：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园地”/208 “武汉时期”的终结以及它为什么在历史中被遮蔽/216 分共之后：摘掉“国民革命”的帽子？/220

## 第六章 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器”与革命思想的更生/224

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尴尬：从政治领域回到文艺领域/229 “当一个留声机器”：命题的提出及其历史指向/237 “不当一个留声机器”：革命的另一理解 and 路径/244 批判资本主义与知识阶级的转向/257 意识斗争理论与现实革命的碰撞/265

## 第七章 “硬译”与鲁迅的论战层面/268

在正确立场之外：如何定位鲁迅在论战中的位置/268 从“直译”到“硬译”：文化改造立场的延续/271 作为“报复”的“硬译”与“无产阶级文学论”：主体改造理论的颠覆与深化/282

## 第八章 “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出路与革命的出路/296

写小资产阶级与反思无产阶级革命/296 不同位置、立场上的“小资产阶级”观/310 观念与个人的“出路”/317

## 结 语 理解“左翼文化运动”/325

参考文献 /346

后 记/361

## 导 言

1928年2月,上海新文化知识分子刊物《一般》发表了朱自清的一篇长文《那里走》。这篇文章在第一时间真实传达了一个新文化知识分子面对时代转折时的不安、惶惑、思考以及抉择。

在刚刚过去的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经历了从巅峰到谷底的突变,国共分裂引发一系列白色恐怖、红色恐怖的高潮。曾经积极投入“国民革命”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和新青年被革命甩出,逃亡到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栖身,疗伤之余,革命政治中蓄积起来而常被压抑的革命意识被转移到纸面上,思想文化界一场新的革命正初露端倪。

面对这场拉开帷幕的时代大戏,身居“死城”北京<sup>①</sup>的朱自清似乎比身处风暴中心的同人们更敏感地体会到它的分量和逼迫性。除了个人禀赋,这相当程度上源于他并非以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阶级”的一分子来看待“大革命”已经带来与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更自觉地属于“五四”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他的思想、意识乃至感觉方式。他内在于新文化运动,内在于它的可能性和它的限度。他以“五四”造就的历史性主体的身份看待、衡量时代的变化——无法去除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质疑交织于其

---

<sup>①</sup>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学界遭到重创。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北京陷于“恐怖时代”,新文化知识分子与新青年纷纷离京南下。

间——并不将自身的选择困境仅仅看成个人境遇，而是意识到它背后有时代的脉络，有新文化运动展开中遭遇的历史命运。

在《那里走》一文中，“时代与我”一节集中表达了作者对“新时代”的观察、把握。他力图勾勒“五四”之后十年中时代变化的根本：

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 Class 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三四年来的，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

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sup>①</sup>

虽然朱自清在文中称十年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是连续的，而且都囊括在由“五四”开创的“新时代”中，但他更强调以“五四”为标志的“解放时期”和以“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时期”在精神上的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冲突。而后者所开创的将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大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sup>②</sup>在作者看来，作为这个时代标志的阶级斗争将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展开，将在何时终结都是不确定的；可以确定的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造出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的行动准则、学理研究的理想将在“大时代”中没有容身之地。于是：“我总预想着我们阶级的灭亡……这灭亡的到来，也许是我所不及见，但昔日的我们的繁荣，渐渐往颓废的路上走，总可以眼睁睁看着的。”<sup>③</sup>

然而，事实上，“解放时期”与“革命时期”这两个阶段真的如此截然对立吗？革命政治的兴起真的意味着对文化主义、个人解放的全面摧毁吗？而且，更重要的，如果承认从“解放时期”到“革命时期”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那么，如何看待、解释“五四”造就的新青年决然地从高扬个人绝对价值、崇尚学理研究、充满浪漫情感走向服从“理知的权威”、“有组织的工作”、主义的宣传、无条件的牺牲？

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理解模式，将这一转换过程看成是外来政治力量介入、改造乃至“侵害”的结果。不过，朱自清倒没有把它仅仅看成外力的

<sup>①</sup> 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229—23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sup>②</sup> 同上书，第226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231页。



作用,而是将两者视为“理想与实际的差异”。换句话说,他将后者看成“五四”的“解放”理想落到现实“革命”行动时必然经历的变形和颠覆。文化理想主义虽然纯粹、珍贵,但要诉诸实际的改造则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实碰撞,以致粉身碎骨;“革命”虽然残酷、污秽,但它势必赋予理想主义以现实形态,并冲破理想主义的自我限制。

不过,朱自清将“解放时期”与“革命时期”作截然对立的描述,一方面出于自己切身的体验和观察,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接受了当时日渐盛行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基于此时代阶级分化与斗争的现实,更属于有行动旨归的构造性理论。特别是共产国际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具有不可调和的斗争关系。这意味着,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并必然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消灭告终。朱自清相当程度上将这一理论性构想作为现实描述以及理解自身处境的前提,并将其固定化、结论化,由此塑造出一个对立性的现实图景,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小资产阶级的使命在“促进自己的灭亡”的命题。而从文中可以看出,这并非他个人的见解,而是代表了一批与革命接近而仍有距离——不能完全舍弃自我全力投入——的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理解和选择。

从朱自清的整理和反思可以看出,20年代后期新的政治形态和思想理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文化知识分子、新青年对“五四”以来历史的理解框架。而之后多年的历史书写其实一直处于这一框架的延长线上。这一框架强调20年代中期兴起的革命政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断裂式”发展——前者的出现决定性地改变了后者发展的轨迹,乃至颠覆了后者。只是在程度上,或者为突出“无产阶级”文化政治的主体性而强调两者截然不同<sup>①</sup>,或者为奠定“无产阶级”文化政治更广泛的基础而强调两者的连续

---

<sup>①</sup>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提到:“在三十年代初期,人们(包括瞿秋白和我)却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先天不足的,短命的,到‘五卅’运动时,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4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他本人1931年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名义发表的《“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中就称:“‘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权时对于封建势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然而这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转下页)

性<sup>①</sup>；在评价上，或者崇尚“五四”的纯粹理想而否定这一转折，或者认同革命政治而视这一转折为必然。然而这一理解框架相对模糊的问题是：如何理解 20 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型革命政治的内在历史源头，尤其是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如何定位？

无可否认，20 年代中期苏俄政治力量的介入给中国带来一种列宁式政党的思想、组织、行动方式<sup>②</sup>，并直接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勃兴和“大革命”的展开，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形态。那么，是否意味着这只是外来因素介入的结果，它与中国固有的新文化运动只构成嫁接或改造关系呢？如果我们回到新文化运动自身展开的历史脉络中就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一系列实践方式在“五四”高潮过后都陆续遭遇内在、外在的危机。如融合了“五四”求知与劳动崇拜精神的“工读互助运动”、体现身心合一理想的“新村运动”均昙花一现；诞生于五四运动、代表学生社会独立品格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陷于分裂；作为“五四”精神标志的“科学”思想在胡适等人的推动下渐渐落实为文史领域中的“整理国故”，其学术工作固然有价值，却同时引起复古读经的回潮（详见第三章论述）；而“五四”时期取得“实绩”的新文学一方面遭遇创作瓶颈，一方面在市场压力下面临生

---

（接上页）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文学导报》第 1 卷第 2 期，1931 年 8 月 5 日）据说，此文是茅盾与瞿秋白讨论后的成果。瞿秋白自己在 1932 年撰写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更明确地提出：“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的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学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文学》第 1 卷第 1 期，1932 年 4 月 25 日）

① 毛泽东在其延安时期的代表性论述《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五四”开辟了共产党成立、“五卅”以及北伐战争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4—64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年）。

② 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曾描述列宁式政党的特点和作用：“世界革命的动力，主要在其共产党形式的组织，也就是列宁所谓‘新一类党派’。……组织虽小，效率却出奇地高，因为党可以向成员要求完全的牺牲奉献。纪律之严，胜过军队。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党的意志决策。高度服从奉献的精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事实上，列宁模式吸引的对象，往往是社会上原有精英阶级的年轻一辈。这种现象，以第三世界为明显：优秀青年大量加入组织，壮烈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间或也有成功的例子。”（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第 109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存困境(详见第一章论述)。

在此基础上,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新的政党政治兴起。原有的旧的政党政治莫基于晚清至民初的宪政运动,其突出特点是以传统社会中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为中心组建,依托于地方士绅或官僚军阀,有显著的上层政治的特点。相互之间虽争夺激烈,却大多缺乏真正的群众和社会基础,政党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政争多体现为政客间的纵横捭阖。<sup>①</sup>这样一种政党政治形态在民国成立数年之后已显得弊端丛生,再加上袁世凯与北洋系的擅权,所谓宪政体系、议会制度几乎名存实亡。

1915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动力就在于痛感未经历真正文化、思想、道德、伦理革新洗礼的民主政治只能徒有其表;因此,要从腐败已极的政治领域中退出来,在文化领域中开展一场思想革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检讨文明、道德、伦理、价值得以成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再构想合理的社会、文化、政治形态。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基调之一是弃绝、隔离于现实政治,特别是当权者和政党。像胡适1922年回顾自己当年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觉悟”时就称:“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事,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sup>②</sup>

因此,他们的实践性工作要从文化实践和社会性实践入手。虽然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新文化运动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新青年们的社会实践方式仍是从构造自发的、独立的、纯洁的社会团体入手。直到1923年左右,在一系列以新青年为主体的社会实践陆续失败之后,集中了“五四”学生精

---

<sup>①</sup> 张玉法在《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中曾分析民初政党之纷乱、庞杂与两方面的政治因素有关:一、“假政党为争权夺利之具”——“一般党员确是既无政治经验,又无政治节操,随声附和,各拥声望素著之人,以增进个人利益或地方利益而已”;二、“为政治树立对抗力”——“民国初年的政党,部分是试图对抗政府、或协助某党对抗政府而成立;部分则是政府主动组织或扶持而成。更有些人,欲谄媚政府而无所凭藉,乃组织政党以为帜。……惟造成此种反动力量之人,多基于感情或意气,对树立政治对抗力的真意缺乏了解,终流于朋党之争。”(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第39—4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

<sup>②</sup>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6月18日。

英的“少年中国学会”中仍有核心人物主张：“所谓青年运动者，必须不利用已成势力，不依赖过去人物，自行组织，自为训育，以良知为本，以真理为归，超然独立于一切政党教会之外者也。”<sup>①</sup>

然而，到了20年代中期，“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人物分别介入政党，乃至自行组党：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魏嗣銮、周太玄、杨效春等组织了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刘仁静、黄日葵、赵世炎、杨贤江、沈泽民、张闻天等发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周佛海、吴挹峰等加入国民党；康白情、孟寿椿等加入新中国党。<sup>②</sup>可以说，20年代中期新兴的党派政治的主力是“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或者说相当一部分“新青年”在20年代中期实现了向政治、政党的转向。在新的党派政治框架下，一方面，“五四”时期的“青年”这一整体性观念被相对化；另一方面，各新兴政党都以“五四”以来形成的新青年为争取对象——他们代表有革新意愿、尚未被旧势力“恶质化”的新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sup>③</sup>

因此，与其说外来政治力量的介入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使文化运动变为社会革命，不如说新文化运动中已孕育了由思想革命进入社会革命的基因。而且，新青年转向党派政治并不是由苏俄革命这一单一因素导致的。如霍布斯鲍姆指出：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彻底摧毁了19世纪的政治模式，是19世纪西方文明——“这个文明，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资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sup>④</sup>——崩溃的起点。反思这一灾难性后果使得思想界和社会寻

① 王光祈：《德意志青年运动》，《少年中国》第4卷第5期，1923年7月。

② 天裳：《中青史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6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

③ 吕芳上在《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一书中曾具体梳理20年代中期之后，新兴党派力量开始积极介入学生运动、争夺“学权”，在学生社会中发展政党力量的过程。其中提到，至1926年，如国民党这样的“老革命党”，其党员总数中学生所占比例达26%，居于首位，有数字报告的12个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份。（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27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4年）

④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9页。

求一种新的“觉悟”。因此，一系列革命性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在一战之后蓬勃兴起，无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均为这样一种历史态势的体现。就此而言，民国初年奠定的民主议会与政党政治遭遇根本危机，最终被诉诸社会、群众的革命政治取代具有更深远的背景。在这一时期，连相对保守的基督教青年会都从关注个人救赎、强调社会服务转向宣扬“社会福音”、诉诸社会改造和政治重建。<sup>①</sup>

而新文化运动以及运动所培养的新青年正是为一种新型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sup>②</sup>而事实上，五四运动不仅为共产党准备了思想和干部，也为其他社会性、革命性政党准备了思想与干部。正因为这些新型党派有如此的同源性，它们之间的争夺、论争才成为20年代中期言论界的突出矛盾。翻看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醒狮》等党派性刊物，所谓革命讨论主要围绕共产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相互批评展开。

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性、革命性政治不仅是一种组织、行动形态，同时也携带新的思想形态。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一方面诉诸一整

---

<sup>①</sup> 《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一书中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的进步运动迅速发展起来，青年会各个阶层逐渐全面接受了宗教自由主义。……为了在混乱岁月里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青年会迅速地将工作重点从社会服务转向了社会改革。北京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柴约翰(John Childe)认识到学生们不再注意社会范围之外的宗教，他批评青年会在劳工问题上的犹豫和不清醒认识……天津青年会的韩慕儒(Roscoe M. Hersey)还准备了有关社会改革的宣传册子，宣称宗教的最终目的是‘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到2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从青年会学生调查来看，虽然精神重建仍对学生非常重要，但他们更倾向于立刻直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许多学生越来越不满意基督教会，‘面对社会、工业和政治问题带来的战争和其他灾难，难道不是缺乏基督精神才使得教会仍然自鸣得意？’……也许吴耀宗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学生的心态，‘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称之为精神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代之出现的、在学生中普遍流行的是社会革命’。赵紫宸对此情况也表达了相同思考。‘在我们学校的青年人中，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期望着信仰的再阐释，不仅要表达他们的爱国心和宗教热情，而且在社会拯救和社会发展方面能见证他们的个人理性方式。’”(邢军：《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第46—47、95—9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1页。

套从世界观到价值观、认识论的哲学体系，一方面包含对经济形态、社会形态、观念形态的“科学”认识，同时还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一种知识、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体对新文化运动发展中遭遇的危机起到救助作用。

本来，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于建立一系列自主、独立的专业领域；然而，在其展开过程中，对政治的隔绝、对纯粹学理的追求等会造成新文化实践越来越趋向自给自足的专业主义。比如，尽管胡适一再强调“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捉妖打鬼”，但仍难以避免“整理国故”走向学究式研究，甚至复古潮流。<sup>①</sup> 在新文化日渐占领学术、文学等领域并日趋规整的态势下，新文化实践的自然延续反而导致合理主义的兴起——原本属于批判性的研究、创作成了自我生产的“纸枷锁”。新文化动力的衰退，新文化实践走向反面，已是鲁迅等人在 20 年代中期就觉察到的问题。同时，鲁迅等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依靠重建“五四”式联合战线、重新倡导社会批评等方式已经不能再现或拯救新文化的立场，希望或许在那些虽不成熟、但有反抗精神和行动性的青年。

而那些更新一辈的“新青年”在经历社会革命的感召、“五四”时代的悲剧性终结（“三·一八惨案”）之后，多数投入了“大革命”，并成为这场革命的依靠力量之一。但这场早产的、充满矛盾和内部斗争的革命既未实现对新青年的彻底改造，也没有使新青年真正发挥主体性作用。由“五四”新文化培养出来的、带着难以消除的批判性思考习惯的新青年在“大革命”中遭遇的更多是革命政治的“现实”、事务性、钩心斗角、混杂、善变、污秽、残酷、单调……这与他们理想的革命相去甚远。而“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它失败

---

<sup>①</sup> 参见罗志田《机关枪与线装书：关于“国学书目”的论争》一文中相关讨论（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沈雁冰在1924年5月19日发表于《文学周报》第122期上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专门批评“整理国故”引发的弊端：“在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步，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是上比专家则不足，国故并未能因多数人趋时的‘整理’而得了头绪，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攘夺了专家的所事，放弃了自己眼前所能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

的方式——上层密谋、斗争而以青年为牺牲品——使得革命青年一方面经历幻灭，一方面郁积了对“应有的”革命的热情与想象。因此，当他们被抛回言论界时，就将对革命的反思以及呼唤真正、纯粹革命的想法转移到纸面上。

1928年前后，“‘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唯物史观的倡导等一系列理论工作，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社会史领域抑或哲学领域展开，其根本指向都在反思、检讨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革命，应如何认识，应走何种道路，应具备何种前提，乃至革命者应具有何种思想、主体状态——这些都是在“大革命”过程中逐渐凸显的迫切问题。参与这些讨论的人虽然不少有政党背景，但这些讨论并非在政党的组织影响下展开，而是在相对独立的言论空间中自发展开。因此，它们也不单是对实际进行中的革命的呼应，而是相对独立的对革命的思考、反思、想象甚至批判。同时，这些讨论所借助的资源也超出革命前和革命中所能提供的范围，因为，与讨论同时展开的是一轮译介革命理论的高潮。

因此，这一轮理论讨论的特点在于：在相对独立于政治领域的言论空间中重新思考革命的根本问题并想象新的革命形态。这样一种方式带有很强的“五四”式“思想革命”的烙印。只不过，这一轮“思想革命”并未拒绝现实政治而是时刻保持与现实革命的张力。也正因为它并非意图在现实革命之外再造革命，所以当革命党意识到介入革命理论讨论的重要性并以政党力量介入时，相对独立的革命思想讨论迅速被各种政治势力收编，结合成新的文化政治形态。

在以上概述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新青年与革命结合、分离、再结合的反复过程中，特别展现出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超越现实政治为前提，在一个彻底批判性的基础上构造了文化与政治想象性结合的整体，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就是这个想象性整体面对现实、面对革命而分化、破碎、变形的过程。但是，当革命在现实条件下变得虚弱，甚至失去方向感时，同样是在一个批判性的文化空间中再造了对革命主体、革命理论的同—性想象，重塑了对革命的认同。因此，文化与政治是在各自意识到自身局限和需要一个他者的前提下重新结合起来。虽然，从现实标准衡量，文化与政治处于高

度不对等的状态,但二者却并非仅仅显现为后者引导前者、吞噬前者的关系。往往在文化领域中产生着根本的政治动力,而政治又赋予文化以现实形状,这两者互为限度,同时互为条件。

对于真正的文学家来说,与现实一起摆荡是文学者生存的条件,在此意义上政治是产生文学的真正土壤。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曾辩证地阐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政治是行动。因此与之交锋的也应该是行动。文学是行动,不是观念。但这种行动,是通过行动的异化才能成立的行动。……产生文学的是政治。然而,文学却从政治中选择出了自己。……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学。……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这是为使文学能开花的苛烈的自然条件。娇弱之花没有生长的可能,劲秀之花却可获得长久的生命。<sup>①</sup>

当然,这里“政治”更准确的含义是“革命”。而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政治不仅需要文化支持,更是文化的实现形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在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外还要有一个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甚至是产生前两者的条件。如果我们不把《新民主主义论》看成某种结论,而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历史哲学命题,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寻着它所提供的线索去看待中国现代革命史中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包括它的后续发展。

## 二

回到文学领域,如果不把“文学”与“政治”看成两个对立的实体,而是

<sup>①</sup>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34—13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从机能的角度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内涵以及它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对相关历史问题可能会有一种新的理解角度。

从“五四”时期到革命文学的兴起长期以来被概括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一由当事者提出的解说模式本来暗含着“文学”与“革命”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但它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被简化为文学向政治的靠拢——摆幅从对峙的文学一端摇向政治一端。而这一简化的关键又在于,“革命文学”的标准形态被设定为以“左联”为代表的有鲜明政党倾向的“左翼文学运动”<sup>①</sup>。可事实上,“左联”的准政党特性是否能规定“左翼文化运动”的根本大可质疑(详见“结语”部分的讨论)。如果说“左翼文化运动”在1930年代占据文坛主导位置而形成“左翼十年”的描述有其历史根据的话,这并非意味着“左联”借助其政党特性才获得最广泛影响——恰恰相反,研究者公认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阻碍“左联”发展的要害——“左联”的影响力取决于它将有内容的政治性最内化地结合于自己的文化实践、政治行动、组织形态乃至主体状态。正因为如此,它才相对同时代其他表面结合于政治乃至文人化的文学团体更有力量,并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代产生出某种主导性。

以从“五四时代”到“左翼十年”概括1920、1930年代的文学发展脉络一方面基于现象描述,一方面也暗含对立模式。如朱自清在《那里走》中就已预示的:“五四时代”代表个人的、自由的、解放的时代,“革命时代”则代表集团的、被束缚、被决定的时代。但这样一种看法,正是把“革命”、“革命

---

<sup>①</sup> 在50年代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史权威叙述中,20年代陆续出现的与社会运动、“革命”相配合的各种文学言论长期被视为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成熟形态的“萌芽”;“大革命”失败后一时集中涌现的关于文学与革命的讨论与论争则被认为是“左联”成立的“准备”与“前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图景?其根本在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是以现代“革命史”为蓝本的,而在中国共产党书写的革命史中20年代国共合作促成的国民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真正的革命要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开端。尽管这个新阶段的绝对正确性在下一个阶段又遭到了否定,但它已是线性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相对高级的一环。况且那些经历了20年代的革命而最终汇入“左翼文学运动”的“革命文学家”在当时已认同于这样的历史认识,从而在文学批评中也创造出相应的文学发展的阶段图示,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这些带有规划性质的批评最终演变成大家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图景。